

庆 祝
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四十周年



汪应文论文选

吉林省图书馆学会
四川省图书馆学会 联合编辑
成都东方图书馆学研究所

汪应文选集

吉林省图书馆学会
四川省图书馆学会 合编
成都东方图书馆学研究所
一九八八年

汪应文论文选

吉林省图书馆学会

四川省图书馆学会

成都东方图书馆学研究所

主编

成都东方图书馆学研究所出版

四川省图书馆学会发行组发行

(成都市总府街六号)

成都市自力印刷厂印刷

1988年

字数 100千字

印数1—1000册

四川省新闻出版局准印证88048

3.00元

简 介



汪应文，男，1908年生，湖北汉阳人，教授。国立武昌中山大学文预科，武昌中华大学中文系修业。武昌文华图专校本科毕业（1935）。历任武昌文华图专校图书馆学、档案学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史地系教授兼图书馆馆长、重庆西南人民图书馆图书部主任、西南师范学院图博科教授、四川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南充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兼图书馆馆长。在任职期间（1941—1987）曾兼任重庆今文月刊主编、中华图书馆协会监事、汉口华中日报总主笔、总编辑及该报附刊“图书与文献”主编、四川省图书馆学会第一、二届副理事长、第三届学术顾问、南充图书馆学会顾问等职。除教课期间所编印之讲义外，曾在文华专校季刊、中华图书馆协会季刊、重庆今文月刊、华中日报附刊图书与文献上发表过图书馆学、目录学、档案学及文史方面的论著与译稿三十余篇。近年1979至今，在南充师院学报、四川图书馆学报、浙江图书馆学会的“图书馆研究与工作”等刊物上发表有“版本研究和目录学的关系”等论文七篇，受到国内外的重视。其中“图书馆将如何迎接信息时代”、“图书馆起源于档案库考”被转载于“人大复印全国报刊资料”、被摘录于“新华文摘”等刊物中。“图书馆起源于档案库考”并获到四川省第二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三等奖。

序 言

应文于 1933 年按规定以大学修业满二年以上的资格，考入武昌文华图书馆专校本科。毕业后一直未离开图书馆。在参加此一专业课的教学中，曾编纂过一些讲义之类，教课之余亦曾写过一些论文，但均属“从书本到书本”的学问，了无新义。从解放前夕起，开始有些图书馆行政的实践活动。虽然并未离开教书，但思想境界是大有变化的。尤其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内各地图书馆学会风起云涌，个人亦随诸君子之后学习探索，增加了不少新的知识，光阴荏苒，忽忽已逾八旬，近顷国内各社会团体，以建国已满四十周年，虽然建国大业愈来愈艰，但回顾已经取得的成就，不能不倍加兴奋，更不能不坚持“行百里者半九十”的苦训倍加努力。在此一信念之下，图书馆界有人发起，就四十年来学术造就尚有一定成绩可观者，特出选集，作为纪念。四川方面经成渝南充等地学会推选，以拙著试为“抛砖”之资，至感荣幸。因此搜集近年论著，包括未经发表过者，共得十八篇，以副感意。自顾内容度浅，文字粗疏，尚待商榷之处亦复不少。仍希广大的图书馆学目录学和档案学界的同志，多赐教益，以匡不逮，为幸！

本书文字经四川省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研究馆员张德芳同志亲加审订；又得四川师范大学图书馆研究馆员卿迪夫同志亲自校对。其余成渝南充等地图书馆同志以大力协助本书出版者不再一一列名，谨在此一并致谢。

汪应文

1989、10、18

目 录

序 言	(1)
版本研究和目录学的关系	(1)
图书馆教育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13)
图书馆学简论 (叙论之部订正稿)	(30)
图书馆将如何迎接信息时代	(47)
读书的艺术	(59)
图书馆起源于档案库考	(72)
谈索引的来龙去脉	(81)
南充师院线装书草目序例	(91)
近现代西方档案馆事业的发展	(99)
版本余话	(109)
图书类分准则 (草案)	(118)
简论西方出版事业的起源与发展	(125)
试述本草目录学	(144)
有关线装书二、三事	(149)
文献工作兴起与活动情况	(151)
简论我国中古时期的藏书楼	(155)
苏联对档案分类的立法	(163)
公共图书馆的未来	(165)

版本研究和目录学的关系

一百多年前，张之洞以四川学政的地位，告诫当时的“生童”们说：“读书不知要领，劳而无功；知某书宜读，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①这番话虽是为当日考秀才的人们讲的，实际上对任何时代任何治学的人都有用处。他所说的“知要领”就是通过目录，知道自己所需要的资料有没有，有哪些，主要的是什么，次要的是什么，和它们在什么地方。这是目录学的知识。他所说的“要得到精校、精注本”，就是要判断这种资料的“载体”——一本子是否可以信赖，权威性如何。这是版本学的知识。拿他这番话去检查他的《书目答问》，我们感到这部书确是按这两点要求而编撰出来的。他把版本学和目录学结合得很紧，也使我们认识到：研究版本学的正确目的，就在于很好地配合目录学，而为治学服务。

我国人研究书籍的版本，姑从现时尚存的明代私家藏书楼——天一阁的历史起算，到现在也有四百多年了，然而藏书家（其中还包括部分自己无力藏书，但帮助别人搜求、鉴别各种版本，和欣赏、研讨别人所藏珍善本的所谓“鉴赏家”）津津谈版本的，大多是以玩骨董的态度去对待这件事。他们所追求的是宋刻元刊，明以下的本子多不大理睬。虽然他们所出的目录和目录性的著作也很可观，但为治学服务的却不多见。因此张之洞在《书目答问》中，在介绍了一批“书目”之后，也顺便提了一下私家藏书和示人以版本如何的书目。但张氏却斩钉截铁地说：

“各家书目或略或误，或别有取义，乃藏书家所贵，非读书家所重，皆非切要”。^②

这种侈谈“百宋千元”的人所撰的书目，不仅无补于治学，而

且给社会遗留了两种不好的影响：（一）是由于认为版刻愈古愈值钱，坊贾为了牟取重利，多致力于伪造古本。而作伪的方法竟使人叹为“神妙莫测”。^④有的甚至使帝王的宫廷藏书也真伪掺杂。如叶德辉谓：

“……又《六臣注文选》袁裴刻本亦伪。内府所藏十部，而作伪居八九。”^④

由于假的宋、元、明版充斥，反而使治学、找资料的人以伪为真，造成混乱。

上文张之洞所说的“或误”，决不是没有根据的。（二）是使人误信：版刻愈古愈是“善本”。根据常识，书以初印为贵，愈晚则重刻或翻印愈多，每变动一次，总或多或少不免有讹之处，因而愈失本来面目。这个理由当然是可以成立的。但是实际上也不能一概而论。一书版本的好坏，因素很多，最主要的恐怕还是出版者的态度和他所选用的底本如何，时间的早晚并不是决定因素。版本的时间愈早，并不都是可以信赖的。兹举宋本一种为例：今日行世的《颜氏家训》均出宋孝宗淳熙七年（公元1180年）沈揆校刻本。据沈氏卷末跋称：

“……揆家有闽本，尝苦篇中字讹难读，顾无善本可讎。比去年春来守天台郡，得故参知政事谢公家藏旧蜀本，行间朱墨审定，则其子景思手校也。乃与郡丞楼大防，取两家本读之，大抵闽本尤谬误……于是稍加刊正，多采谢氏书，定著为可传。又别列考证二十有三条为一卷，附于左。若其转写甚为与音训辞义所未通者，皆存之，以俟治闻君子。”^⑤

从上面的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出：较淳熙本更早的闽本蜀本都有讹误之处，而闽本更甚。淳熙本虽采用了谢景思的校订稿，又经过他和楼大防二人校讎一过，但转写讹误和音训辞义不了解的地方仍然很多，只能照样刻印出来。这一书的宋版情况就是如此。不过宋代的出版家中像这样讲老实话的人并不是很多的，尤其当时“书林”中的人如程舍人、陈道人之流，可能比明中叶以后

的坊贾要规矩一点，但也不能相信他们都是很认真负责的。所以一部书刻印的时间愈古愈是“善本”，这个传统观念是应该打破的。

张之洞在《书目答问》中不提宋刻元刊（但明本尚通行者，有时也开列一点）。他在该书《略例》中虽然也提到“善本”、“精本”，但不是“仿宋”的先生们意识中的“善”，而是相对的、“彼善于此”的“善”，意即本文开始所引述的“精校、精注本”。以“精校、精注”作标准，倒是和时间成反比，每每是“后来居上”的。因为古书中的精校、精注本，到今天很多已变成普通的影印本。更有不少是由后人加工而成为更精善的校注本了。例如宋本世采堂的《韩文》，这是公认的宋版中的精校、精注本。但明代东雅堂的《韩文》就比世采堂的《韩方》好，因为它是以世采堂本作底本而又经过徐时泰重新校过的；而现在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的《韩文》又比明版东雅堂本更好，因为它是以东雅堂本作底本，又附有清人陈景云的《点勘》四卷而印出来的。解放以后，我国版本较好的古书，除有很多被影印成为通行本外，如为新印本，大概都是经过精校的。尤其是组织专家标点而印出来的本子，如《资治通鉴》、《二十四史》等，尽管校点工作仍不能说毫无问题，但无论如何，对于治学的人终是“功德无量”的好事。所以书籍的版本愈古愈善，并不尽然，倒是“后来居上”确属永远颠扑不破的真理。不过在我国，版本学上一直是把版本愈古的称为“善本”的。这种“善本”应视为沿袭下来的专用术语。这个术语在使用之初也许并不是根据学术上的价值观念，而是鉴于书是古代印制的，传世的数量已不甚多，愈古就愈少见。“物以稀为贵”。善本之“善”，大概是这样产生的。

研究古书的版本，在西方也是由来已久的。英、德、法语中的 Bibliography (ic) 这个词，今天既代表“书目与目录学”，又代表“书史学”，涵义很分歧。但如果把它的词义发展史研究一

下，就知道，这些歧义的产生是很自然的。这个词的本义就是“书籍的描述”。把被描写的各书排列成表，就是我们所说的“目录”了。从描述到排列是根据一定的理论与方法的。研究这种理论与方法就是“目录学”。在西方从古代到中世纪，书籍也都是写本，所以这种目录本是古写本的目录。在印刷术发明以后，这种目录中又加入了古印本，这种古写本与古印本的目录不止出于当代人之手，后代收藏家与鉴赏家也编写有这种目录，所以 Bibliography (ic) 就成为这种目录的专称。这个词到今天虽然也被人滥用，但目录学界为了维持它的特点，仍然铸造了一专用名词，叫做 Descriptive bibliography (ic) (描述目录)。由于这种目录自始以描述书籍为职志，所以除需要表明的内容特点外，尤重视书籍形态、以及制作与流传情况的描述。和我们过去的那些“善本书目”重边栏、版口、行款、字体、纸张、墨色以及何家收藏过，何人加有题识等，命意是一致的（当然具体的方式方法不完全相同）。为什么编制“古本”或“善本”书目要描述一书的物质形态以及制作与流传情况，因为要区别当时和后世同书而不同来源的各种版本。版本不同，内容就不免有这样或那样的差异。描述目录所描述的东西，实质上就是图书馆一般目录上所著录的“出版项”(Imprint)和“稽核项”(Collation)的扩大。尤其是“稽核项”更加详细，如行款、字体、纸张、折页、装饰、及收藏人的书帖、手迹、印记等，更是一般书的目录所没有的。西方的“古本”或“善本”书目所描述的既是各书物质的形态和制作与流传情况，因而就有人研究和归纳、整理而得出了书籍的编撰、校讎、出版、印刷、装订、发行（书商与书市场）、收藏等方面的系统知识。这些系统知识的总和就是“书史学”。于是原代表这种目录的 Bibliography (ic) 这个词，又代表“书史学”了。也由于从写本时代起就有了目录，才引起了对目录的研究，尽管今天的目录学远远超出了昔日的范畴，但就古写本、古印本而言，仍然

是自成体系。^⑧

我国人研究古书版本的历史是悠久的，所出的“善本书目”也不可谓不多，优秀的版本学家也并不乏人，像钱遵王、黄尧圃、以至近代叶焕彬、缪筱珊等都算是用力勤而且是有一定成绩的。但是属于书史学方面体大思精的著作并不很多。在目录学方面也还有很多不足之处，举一个例：现在检查一书各种版本的工具书，只有邵懿辰原著而由其孙邵章补充的《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还收书较多，实际它所收的古书并不是很充分的，著录简略而且是有错误的，例如《文选李善注》条下，著录何义门评点的“海录轩套印本”是不明确的；而“续录”中又重复著录此书，也没有指明为“何评套印”。又此书翻刻本甚多（有文彬堂、文盛堂等重刻本）亦未一一列举，仅以“又有翻刻叶本”六字带过。又该书目对各书的祖本及以后各本的继承关系与优劣的评价也没有认真地注意到。莫友芝的《邵亭知见传本书目》和孙殿起的《贩书偶记》等可以作此书目的补充，但有时仍然不能解决问题。还有一点：过去我们的“善本书目”，包括以“藏书志”、“题跋记”……为名的著作虽然不少，但一直未见有人研究它们的著录方式方法和谋求规格的统一。像国外的A.W.Pollard,R.B.Mekerrrow,A.Esdaile,J.D.Cowley,W.W.Greg,F.Bowers等人论述有关古本书编目的著作，在我国虽然有所触及，但仍然算是一个空白点。现在一些从事“善本”书编目的人，基本上还是按图书馆对普通书编目的办法处理，不知道国外所行的还另有一套。（当然我们也并不主张生搬硬套他们的那一套）

现在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根据周恩来总理的遗愿，要求各地普查与参加汇编“全国善本书目”。这项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过去考订、记述古书珍善本的书目和论述文字不可胜数，但从来就没有作过反复核实、去伪存真的调查和统计工作，也没有一个总的记录。姑从鸦片战争开始起算，这一个半世纪是中国社

会动乱、变革最剧烈的时代，古书的内毁外流不知有多少。以保存文献负有攸归的图书馆而论，重视这件事的并不是很多的。有的甚至家有“宝藏”，自己还不知道；有的收书较滥，选择不精；有的虽从前作过记录，但问到原有多少，现在实存多少，实存的具体书是哪些，恐怕很多馆是心中无数的。从整个国家来说，我们没有这种总的目录，也不能具体而圆满地答复这一系列的问题。这和我国今天的国际地位是很不相称的，不能不认为是一缺憾。再说古刻古钞，从学术价值上看，虽然不能说全是“善本”，但它们却是后世流传古书的祖本或较早的底本，所有的精校、精注本都是从它们的基础上衍生出来的。其实有不少号称“精校、精注本”存在的问题仍然很多，或者校注的工作并未完成，而且还有很多古书尚待校订注释（当然以有某些参考价值，需要校订注释者为限）。因此普查和汇编善本书的总目，确属解决上述问题所必需。不仅如此，通过这项工作，还可以促进我们对版本学的科学研究，和提高我们书史学与目录学的质量。

版本研究和提高目录学的质量有什么关系呢？目录学的一般要求是使人通过目录而得到他们所需要的书刊资料，而目录学的最高要求是示人以治学的门径。所谓“即类求书，因书究学”（郑樵语）是张之洞所说的读书须知要领，知某书宜读或不宜读，也是指的这件事。必须这个首要的问题解决了，然后才进一步去研究什么版本。按照逻辑的程序原是如此。实际上目录与版本是不可分的，有时甚至要先问某书的版本如何，而后再决定是否使用该书。同一《清史稿》，如果不知道还有“关内本”和“关外本”的区别；同一《英国大百科全书》，如果以为各版均与“第十四版”的各年印本所提供的知识或资料都是一样的，那就错了。又如同样是英语的《牛津字典》，有原本（N.E.D）、节本（shorter）、简明本（Concise）袖珍本（Pocket）及小本（Small）的不同，你以为各本只是详略之分，“略”一点也无妨，又省钱，又免得堕

人“繁琐哲学”，这种想法也是错的。不论国内或国外，大概版本不同（包括版次、版名不同，或书名因版别不同而在“题上项”或“题下项”加有区别字样的），内容是不会完全相同的，因而同书的各版每每是作不同的书看待的。但是出版者为了牟利或达到其他什么目的，而在一书重印时，妄题“再版”、“新版”、“增订版”等；或就别家已经印行的本子，尤其是无人查究的古书，剿袭窜改而冒充“古本”、“原本”、“真本”、“足本”等，以致版本名异而实同的书也是有的，而且是相当多的。目录工作者必须把版本搞清楚，也必须在目录上正确地反映出来。

鉴定古书的版本，如果只着眼于一书物质形态和印制的方式方法，如行款、字体、纸张、印刷等等，而不同时研究它的“目录事项”（Bibliographical data），是不可能很好地完成上述任务的。作为目录，有三个最基本的事项，就是确定书名，著者和出版者对一书的关系。这三项在查考和决定一书版本的工作过程中是不能忽略的，然而这三项有时也并不都是很容易确定的。例如章太炎的《尴书》和《检论》究竟是一书还是二书。如认为一书，则《检论》中并无《中国通史略例》；如认为二书，显然是制造混乱，学术界是不同意的；如认为是一书的两种不同本子，但这里所谓一书，究竟以《尴书》为主，还是以《检论》为主，也会有争论。又如《第五才子书水浒传》，本是金圣叹割取原书的前七十回，并修改加批而成的本子。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的排印本（连同“楔子”称七十一回本水浒），即是根据这个本子，删去金的序和批，并把末一回的回目“惊恶梦”改为“排座次”，重新标点加注而印出来的。虽然书中文字曾依别本作了一些修改，但金的手笔基本上仍被保留。这一排印本抹去了金对此书的加工关系，则目录上仍称它是施耐庵的原著就很有问题了。这个本子既非明代的原本，又非金圣叹的篡改本，应算是什
么本子呢？编目上如果要求循名责实，恐怕是很费斟酌的。又如

《赖古堂尺牋新钞二选藏？集十六卷》、孙殿起的《清代禁书知见录》，据该书扉页所题“情话轩藏版”，称“情话轩刊”本；1959年的《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据该书版口下端所题“赖古堂二刻”，称“周氏赖古堂刻本”。这两个不同的著录究竟以谁为是呢？中国古书的出版者和藏版者题名不同，是常见的事，而目录著录取舍不同，使一些见目不见书的人误认为不同的版本，也是常见的事。以上三例，分别说明书名、著者、出版者和版本所发生的关系。实际上这三方面的问题不是上述三例所能概括得了的。有时这三方面的问题甚至集中出现在一书上，例如：

××图书馆藏有清钞本《金粟诗草》一部，卷端上部，题“屈复梅翁著，马璞授畴、陈长镇宗五评”下部题“曾孙来泰志同录”。此书即清代列入“禁书目”中之《弱水集》。《弱水集》虽遭禁毁，而漏网之本至今尚在，见孙殿起《贩书偶记》。据称其书现藏某馆，系乾隆壬戌（二十九年）所刻（案壬戌乃乾隆七年，乾隆二十九年则为甲申，疑“壬戌”乃“壬午”（乾隆二十七年）之误），卷端所题著者、评者均同于钞本，但刻本中并无马陈二人只字之评语，而钞本中则有之（评语均写在屈氏诗句之右侧，而且文字颇繁）。现在的问题是：（一）《金粟诗草》中所存之评语是否确为《弱水集》中刊落之评语？《金粟诗草》与《弱水集》是否确为一书？（二）刻本《弱水集》中既列有马陈二人名，何以无其所撰之评语？是否因其评语有所谓“违碍”处而被刊落？（三）现存之《弱水集》既无马陈之评语，当非乾隆禁书以前之原刻。然则此本何来？岂其为后来之挖改本或重刻本耶？然此书既遭查禁，则无论挖改或重刻均属不可想像之事。因此，以钞本《金粟诗草》与刻本《弱水集》互校，二者的“目录事项”均有问题，定《金粟诗草》为《弱水集》的底本，尤其定现存的《弱水集》为漏网本，是嫌证据不足的。

以上诸例，均在说明研究版本不能离开目录学知识。版本学的兴起，本是印刷术已盛行、众多印本已出现之后的事；但从目录学角度上看，研究版本只以印本为限是不够的，还要注意印本

出现以前漫长的写本时期。因为今天许多古书的印本，其版本的好坏，早在写本时期就已经决定了。例如：

《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The Anglo-Saxon Chronicle, 一般简称“撒克逊编年”), 是英国人颇感自豪的一部古代文献。此书现存有七种钞本。按其发现之先后, 以 A、B、C、D、E、F、G 七个符标志之。经学者考订, 其中 G、F、B 三本均系自他本传抄而出; 而且有的是残篇或节本, 有的是完全雷同的复本。仅 A、C、D、E 四种本子首尾完整, 文字上可以被认为独立之著作。此四种本子, 根据校雠学观点, 应以 A 本 C 本为一组, D 本 E 本为另一组。此两组之主要不同点在于: D、E 本中有一系列涉及北方之大事记, 又该二本虽亦有征引比德 (Bede) 《教会史》之处, 但并非节略, 而是原文。A、C 本则与上述二本相反。

此书原只有以古英语写成的钞本, 从十七世纪中叶起开始有印本, 十九世纪初始有现代英语的译本。但印本所据的钞本既有上述之不同, 所以也存在着版本的好坏问题。例如 1847 年解尔斯 (Giles) 的现代英语译本是根据格尔雷 (Anna Gurney) 1819 年的最早以现代英语译出的印本而重新译出的; 而格尔雷 1819 年的译本则系据 1692 年吉布孙 (Edmund Gibson) 原文印本译出; 而吉布孙印本又系据惠罗克 (Abraham Wheloc) 1644 年印本再参考 E、B、F 三种钞本而增订的。然而作为母本的惠罗克印本实系以 G 种钞本为底本, 而 G 种钞本, 上文已提到, 是一个有问题的本子。因此, 这一系列印本, 由于底本不善, 一般不认为善本。而学术界认为较善之本仍为 1861 年由索尔甫 (Benjamin Thorpe) 主编, 收入英国“卷档丛刊” (Roll Series) 中之六种写本的平行本 (即将 A、B、C、D、E、F、六种写本之原文与译文分别印出之本)。认为“较善”者, 因为该本中仍有缺点故。^①

由此可见, 一部书版本的优劣, 有时在它“先天”之中 (即尚属印刷以前之写本时期) 即已决定。大概时代愈古的书愈多存在这种问题, 其所以不存在这种问题的, 只是没有发现印本以前的不同写本而已 (写本中也有误本, 如果只是孤证, 不能比较, 也

不能轻于断定写本优而印本劣)。例如在 1959 年新疆诺羌县的《坎曼尔诗笺》出土以前，白居易的《卖炭翁》曾发现被抄录于敦煌卷子中，这是该诗篇在有印本以前的唯一写本，直到《坎曼尔诗笺》出土以后，也发现其中抄有这篇诗，拿它和《敦煌写本》相校对，则《敦煌写本》的文字讹误、脱落和颠倒的多达十余字（全诗只有一百三十六字）；拿它和南宋绍兴刻本《白氏长庆集》中所载的这篇诗相比较，虽然刻本有一两处讹误，但远胜于《敦煌写本》。^⑥这部宋刊本在开雕前所据的底本要上溯至何种写本，是值得研究的。

许多古书，在进入印本以前，存在着多种写本，这是必然的。但在转变为印本时，把多种不同的写本平行地编印出来而成为一书，像上述索尔甫所编印的《撒克逊编年》那样，则比较少见（中国古书中类似的实例也只发现一种，详下文），这是根据校讎学是“存异”的原则并变通其方式而如此处理的。但古书在校讎上更多的是采用“求同”的原则，尤其是国家设官校书，要求统一思想；和师儒开宗讲学，势必“党同伐异”，有这种现象。当然盲目地采用一种写本而排除其他较好的异本，后来又被刊印成书而广泛流传至今的，也是有的。像上述解尔斯的《撒克逊编年》的现代英语译本，就是实例之一。它所据的主要底本是本来残缺不全的 G 本，虽然也曾参考 E.B.F 本加以补充订正，但恰恰漏落了重要的 A.C.D 本。由于底本不善，才被认为并非善本。不过根据“求同”的原则，综合众本整理而成一书，这种校讎方法是不可非议的。中国古代的经传诸子在流传过程中，也采用过“求同”与“存异”的校讎方法。《韩非子·显学篇》谓：“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根据韩非的说法，儒家所传的经传早在先秦就有不同的本子。入汉以后，根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汉书·儒林传》、《汉书·艺文志》等文献的记载，经传授受仍各有师承，家法不同，则教

材的内容也当然是不完全相同的。然而今天我们所见到的九经三传则是统一的本子。这当然与刘向、刘歆父子校书中秘，根据“求同”的原则而综合整统，大有关系。但在刘氏父子以后，贾、马、许、郑讲学，表面上虽宗“古文”，而实际上也揉杂有西汉今文经师的东西，所谓今古文，已是合而为一了。大概在有了熹平石经和正始石经作为范本以后，经传的本文才逐渐统一而固定下来，但各家解说经传的本子仍很纷乱，看看《隋书·经籍志》书名、著者相同的著作之多，可以推知。

至于校讎上“存异”的，在中国古书中也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实例。据俞樾给孙诒让《墨子闲诂》所作的《序文》称：

“墨子死而墨分为三：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今观《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皆分上、中、下三篇，字句小异，而大旨无殊。意者此乃‘相里’、‘相夫’、‘邓陵’三家相传之本不同，后人合以成书，故一篇而有三乎？”^⑨

这番话是很有见地的。其所以“一篇而有三”者，乃校讎时“存异”之结果。如上所述，可见古书在流传中，在它们漫长的写本阶段中（经历了简牍、缣帛、拓本和卷子等物质形态的变化）就已经存在着许多问题，此处只是从校讎学的角度归纳为“求同”“存异”两种结果。（清人校书是兼顾这两个原则的，这是一个进步。）其实还有“伪书”、“逸佚书”、“禁毁书”……等方面的研究。这些都是目录学的课题，也每每涉及版本。（目录学起源于校讎中外皆然，这是不待解释的）

把版本研究局限于由宋迄清的古书印本（当然也包括这期间的写本），鉴别它们是何时所刻，何家收藏过等等，这项工作，从调查祖国文化遗产上说，虽有必要，但从学术上说，意义是不大的。目录学自来就有一个口号，就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章学诚提出的）。这虽然有点“陈义过高”，但以它为努力的目标，却是完全应该的。版本研究如果着重于发掘一书的祖本，知